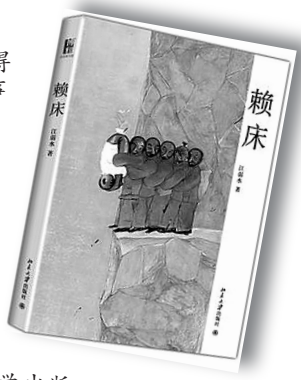


学者江弱水推出随笔集,《赖床》有新发现——

宋朝老男人都戴花 马厩路当时是鲜花种植中心



“他们起得早,因为有许多事要做;睡得也早,因为没什么事好想。”

王尔德鄙视从不赖床的人的话,被用到了浙大教授江弱水新近出版的随笔集《赖床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)的封底上,一语戳中现代都市忙碌上班族的痛处。

而江弱水则给赖床者正名:“适度的慵懒,是人所拥有的最佳形象。”因为,“艺术是闲出来的。”

刚上完两堂课的江弱水,在笔者面前点燃一支香烟。

“报应啊!刚出了《赖床》,就一二三四五全排满了课,有的课八点钟就要上,还谈什么赖床?”但他马上憧憬起两个月后课程结束了的大块闲暇时光,可以自由读书、写作、旅行。

最近,他一口气写了三篇《撕扇记》,揭露台湾学者蒋勋的畅销书漏洞百出,甚至批他为“中文学界的三聚氰胺”,引起文化界热议。蒋勋的粉丝纷纷表示心灵受到伤害,反过来说江弱水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。

江弱水懒懒地说:“我只是就事论事嘛。”



赖床是生产力——

科学是忙出来的,艺术是闲出来的

笔者:您是诗人出身,从前卞之琳、余光中这些诗坛大佬都给您点过赞。后来为什么不写诗,改写随笔了呢?

江弱水(以下简称江):我19岁开始写诗,一心想做大诗人,写的诗也曾得到一些人的赞赏。但1991年写了最后一首诗以后就再也没写过了,因为开始读研究生,研究诗学,理性的东西就和感性的东西发生冲突了。我后来写随笔,其实是对不再写诗的一种心理补偿。我在《赖床》的后记里写了:写诗是应机,为己。写散文是随缘,为人。

笔者:这就是这本随笔集《赖床》的由来吗?

江:不错。以前出版的都是正经的学术著作,写随笔是我做诗歌评论、学术研究之外的事。二十

年前到香港念博士,不时在《明报》、《星岛日报》上发表文章,写着好玩,并且稿费挺高的。在1994年那会儿,写一篇2000字的随笔,稿费折合人民币将近1000块钱,相当于当时内地两个月的工资了。这本集子中,如《赖床》、《庄子怕我们吵着要文化》、《辫子粗又长》、《旧诗新笺》等等,都是那时候写的。1999年来杭州,2002年李杭育办《鸭嘴兽》杂志,邀我每期写一篇,于是有了《兰汤试否?》、《破瓜引》这些文章。一共出了十来期就不出了,我也不写所谓纯文学的散文了。

笔者:第一篇散文《赖床》成了书名,这篇文章戳中了很多现代人的痛处。

江:我习惯夜里看书写作,所以这赖床的习惯保持了三十多

年。头一篇《赖床》初发表时叫《赖床的艺术》,后来编辑说,我们这时代不缺艺术,缺觉,何不干脆叫《赖床》?

笔者:忙碌的人是不是比较成功?您是学者、教授,我看您也挺忙的。

江:忙碌的人给人感觉比较有用,有用的人看起来比较成功。但忙得要死的代价是没有从容的时间去精细地感受,容易导致性灵枯竭。我也有忙的时候,比如这两个月有好几门课要上,一周都排满课。但是过了这两个月,有半年时间我会很自由了,想读书读书,想写作写作,想玩就玩。我的写作也不是很紧张的,不像你们记者赶稿子。我不愿意在报上写专栏,就因为不想每天有催命般的交稿底线。科学是忙出来的,艺术是闲出来的。



读书是种颠覆——

打开看不到或看错了的世界

笔者:虽然您在发现“冷门”,不过也没有避开大热的人物,例如《赖床》里也写到了仓央嘉措。为什么他会火成这样呢?

江:纳兰容若、仓央嘉措都是现在的大热,我自己也未能免俗,写过仓央嘉措。我觉得与仓央嘉措相似的是苏曼殊,一个是六世达赖喇嘛,一个是和尚,却都写了许多情诗。佛教森严的戒律和个人情欲之间的冲突与困局,本身就具有戏剧性。仓央嘉措的情歌里,主人公分裂的身份和焦虑,“不负如来不负卿”的无奈,就是一出唯美的悲剧。

笔者:《赖床》里的书评文章是怎么选出来的?

江:这本书里写到的书,都

是让我深有触动的。例如谈熊秉真的《童年忆往》,写到中国儿童的历史。在宋以前,中华文明是“动”的,宋以后开始转型,主于“静”了。反映在孩子们身上,汉唐时期的孩子是很自由,很有活力的,杜甫小时候“庭前八月梨枣熟,一日上树能千回”,六岁就能出入大人的场合,看公孙大娘舞剑器。可是宋代理学盛行以后,孩子整天不动,成天用功,低眉顺眼,唯唯诺诺,才被人看好,被人叫好,成了鲁迅痛心疾首的“缩小的成人”。对孩子非常势利的期望,非常严厉的管束,就是那以后开始的。从前是因为科举,今天是因为高考。

笔者:有一篇文章谈到从《水浒》看宋朝的“现代化”也让人耳目一新。

人耳目一新。

江:这是从虞云国的《水浒乱弹》谈起。宋朝是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。我们现在外婆家、张生记这样的大型餐饮连锁店,在北宋就有了,汴京的樊楼就是。还有当年的勾栏瓦舍,就是现在的KTV、电影院、戏院。宋代流行的是火葬,观念很现代。西溪的马厩路一带,是宋朝的鲜花种植中心,流水线操作,产销一条龙。宋朝女人戴花,男人也戴花,连老男人都戴花,所以鲜花需求量特别大,这就是社会富足的高大上的表现。日本学者最早认为,宋代是雏形的现代社会。读书就是一种启迪,一种颠覆,为你刷新眼光,打开一个你看不到或者看错了的世界。



批评界的问题——

批评成为小圈子的互相吹捧

笔者:作为批评家,你如何看待批评和创作的关系?

江:我刚刚读了斯坦纳的《语言与沉默》,他开头就说:“当批评家回望,他看见的是太監的身影。要是能焊接一寸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,谁还愿意烦神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什么高见?”他还说,“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的生活。”这些话挺刻毒,但我很赞同。能创作的人就不会去做评论了。

评论家和学者有时候会不甘心,搞一下创作,例如钱钟书写了《围城》。我是钱钟书的铁杆粉丝,但是我觉得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,《围城》是很差劲的,每个人物都带上钱钟书自己的聪明劲儿,人人妙语连珠。钱钟书很难平实地去描摹,总是不自觉地炫学炫才。学者是很理性的,而创作者是浑然天成的感性,好像神灵附体一样,往往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写出来了。

笔者:看来您做批评的时候挺尖锐的。之前您写了三篇《撕扇记》,评蒋勋为“中文世界里的三聚氰胺”,也引起很大反响。

江:其实没想到反响那么大。我的文章出来以后,伤了大批蒋勋粉丝的心。有人便说,蒋勋的书在大陆卖得好,所以你这个大陆学者眼红了,有本事你也写一本。其实,正因为卖得好,而里面讲的东西谬误丛生,所以我会操那份心。中国古代的学者,谁要是犯一个知识性的错误,就没法再混了。而蒋勋这么多离谱的错误,却还能畅通无阻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,西方不会出现。

笔者:可能蒋勋做讲座的时候的个人魅力,让粉丝忽略了他的常识性错误。他讲得通俗好听,比老学究有吸引力。

江:如果喜欢蒋勋是因为那个气质、声调、品位、身段,那

么追他等于是追星,去看韩剧好了。符合受众的需求的确是原因,但不能说有需求就可以提供伪劣产品了。如果能提供质量信得过的产品,为什么还要以次充好呢?

我评蒋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大陆学者荒腔走板的多了,读者对港台学者更看好,有的甚至盲目崇拜。我觉得,任何一个地方的学术界总是有好的和坏的,不可能你全是好的,我全是坏的。

笔者:您这样批蒋勋这样的大众偶像,是不是在评论界挺特立独行的?

江:批评界的问题是,大家都只说好话,隐恶扬善,批评成为小圈子里的互相吹捧,像打太极拳一样,稀里糊涂地整一些名词和理论,不会严酷地触及你的问题所在。我以前就写过不少批评文章,批过穆旦,批过北岛,批蒋勋是学术含量最少的。我的批评是公事公办。

